

大学异地办学助推城市创新的路径与策略

——以苏州为例

马未名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DOI:10.61369/UAID.2026020052

摘 要：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方式深刻影响着城市创新能力的形成。大学异地办学作为高校跨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的制度化实践，已成为产业基础较强但本土科教资源不足城市重构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苏州作为全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地级市，长期面临“产业强、科教弱”的结构性矛盾。自2002年起系统引进国内外高校，形成以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和太湖科学城为核心的知识空间。本文梳理苏州异地高校演进历程，从制度供给、平台建设、空间组织与人才本地化四个维度总结经验，分析外部知识转化为本地产业创新能力的机制，并就引进高校与产业匹配、政府角色定位、空间嵌入方式及长周期投入等问题提出对同类城市的规划启示。

关 键 词： 大学异地办学；城市创新；知识生产空间；苏州

Pathways and Strategies for University Cross-Regional Campus Development to Promote Urban Innovation — A Case Study of Suzhou

Ma Weimi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Under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profoundly influences the formation of urban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University expansion beyond local boundaries—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s of establishing campuses across administrative regions—has become a key pathway for cities with robust industrial foundations but limited loc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rebuild their innovation capacities. As China's largest prefecture-level city by economic output, Suzhou has long grappled with a structural imbalance: strong industrial prowess but underdeveloped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ectors. Since 2002, the city has systematically attract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creating knowledge hubs centered around the Dushu Lake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novation Zone and Taihu Science City. This paper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Suzhou's off-site university initiatives, summarizes best practices across four dimensions—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platform development,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talent localization—and analyzes how external knowledge translates into local industri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t further offers strategic insights for similar cities regarding university-industry alignment, government role definition, spatial integration strategies,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considerations.

Keywords： cross-regional university campus development; urban innova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space; Suzhou

引言

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当前中国城市转型的核心议题。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能力逐渐取代传统要素禀赋，成为城市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进下，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方式深刻影响着城市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提升。然而，对于许多产业基础较好但高水平科教资源薄弱的城市而言，如何快速弥补知识供给短板、构建本土创新体系，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在此背景下，大学异地办学逐渐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所谓异地办学，是指高校突破原有校区所在地的行政区划边界，在其他城市设立分校、研究院、研究生院或合作科研平台，开展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活动^[1]。200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推进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深化，异地办学从最初的规模扩张逐步转向产学研协同与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城市获取外部知识资源、弥补科教短板的重

要路径^[2]。近年来,深圳、宁波、无锡等城市均通过引进异地高校院所推动创新体系重构,这一现象已引发学界广泛关注。

苏州是上述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作为全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地级市,2024年苏州拥有超过4.7万亿元的规上工业产值,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纳米技术等领域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群。然而与这一经济体量不匹配的是,全市仅有苏州大学一所“双一流”高校,缺乏985大学和国家级科研院所的积累。这种“产业强、科教弱”的结构性矛盾,使苏州在向创新驱动转型过程中面临源头知识供给不足、高层次人才短缺的瓶颈。自2002年起,苏州开始系统性地引进中科院、南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在本地设立校区、研究院、研究生院等机构,经过二十余年的持续努力,已与超过30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形成了以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和太湖科学城为核心的高校集聚区,走出了一条通过引入外部知识资源培育本地创新能力的发展路径。本文系统梳理苏州的实践历程与核心做法,提炼其对同类城市的经验启示。

一、苏州引进异地高校落地历程

苏州引进异地高校经历了从教育导入到科研平台深化、再到创新体系建构的渐进演进,三个阶段各有侧重。

2002年至2010年为教育导入阶段。苏州工业园区快速扩张带来高层次人才需求激增,而本地高校培养能力有限。苏州采取“低成本、快速进入”的策略,在独墅湖片区规划建设高教区,通过连片供地、财政代建校舍、提供启动经费等方式降低高校进入门槛。这一阶段以研究生院和研究院为主要引进形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苏州研究院、南京大学苏州研究生院、东南大学苏州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等相继落地,西交利物浦大学作为中外合作大学同期建立,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启动建设。到2010年,独墅湖高教区集聚十余所高校院所,完成了从分散高教资源到集中科教平台的空间跨越。

2011年至2020年为科研平台深化阶段。随着早期高校院所集聚成形,苏州推动异地办学从“人才培养”向“科研转化”升级。苏州将引进重点转向产业研究院、新型研发机构和公共技术平台,中科院苏州纳米所二期、苏州纳米城、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等载体相继建成,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苏州人工智能研究院等机构落地。苏州出台“大院大所合作20条”等文件,独墅湖高教区升级为科教创新区,空间功能从教育承载扩展为科研转化、企业孵化和产业服务并置的复合形态^[3],高新区也开始形成第二个科研资源集聚点。

2021年至今为创新体系建构阶段。在国家收紧全日制跨省异地校区审批的政策背景下,苏州从机构增量扩张转向创新体系整体建构。制度上出台“名城名校融合”系列政策,将高校布局与“1030”产业体系衔接;组织上建立高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校企创新联合体等常态化协调机制;空间上南京大学苏州校区落地太湖科学城,苏州形成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与太湖科学城“双核并进”的格局,标志着异地办学从“引进机构”走向“构建生态”。

二、苏州引进异地高校策略

苏州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性做法,主要体现在政策衔接、平台建设、空间建设与人才本地化四个方面。

(一) 政策供给:降低高校进入的制度门槛

引进高校涉及教育审批、土地供应、资金配套、人才服务等多个环节,单靠高校自身难以独立完成跨区域落地。苏州通过多层级政策工具为高校提供“一站式”进入条件。在平台层面,依托苏州工业园区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国家级平台获得较高的政策自主权;在协议层面,针对不同高校采取“一校一议”“一院一策”的差异化合作方式,在用地、建设经费、运行补贴、人才住房等方面给予定向支持;在建设层面,对早期独墅湖高教区的校舍、实验室和生活配套实行财政代建,高校“拎包入住”,大幅降低了初期投入;在推进层面,形成“市级统筹、区级落实”的分工体系,市级政府负责战略对接和资源协调,区级园区负责土地落实和日常服务^[4]。

(二) 平台建设: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链条

高校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应用,中间需要经历中试放大、工程验证、检测认证、融资孵化等多个高成本环节,单个企业难以独立承担。苏州通过建设公共技术平台和专业化载体,将这些环节组织化、共享化。BioBAY通过建设GMP标准中试车间和生物活性检测平台,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NANO-X通过开放大型仪器和真空互联系统,将高成本服务转化为面向多家企业的共享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进入高技术环节的门槛。独墅湖片区还布局了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苏州纳米城、桑田岛科创园等专业化园区,形成“高校研发—平台验证—园区孵化—产业落地”的连续空间链条。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江苏)的落地,则进一步推动高校专利从“书架”走上“货架”。

(三) 空间建设:知识生产与产业转化空间邻近

苏州有意识地将高校引导至特定功能区,在市域层面形成以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和太湖科学城为双核心的“双核集聚、多点支撑”格局。

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经过二十余年渐进积累,形成多主体网络化集聚形态。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西交利物浦大学、南京大学苏州研究生院、东南大学苏州校区等机构集中分布于独墅湖东岸(表1),与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苏州纳米城、中科院苏州纳米所等产业转化载体交错分布,形成教学、科研、孵化、转化相互邻近的复合空间^[5]。片区中西部承担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功能,西南部形成成果转化空间,东部围绕上海交通大学苏州人工智能研究院、华为苏州研究所等节点形成高端创新片区,多类型

主体高度邻近支撑了知识与人才的高频流动。

太湖科学城形成逻辑不同于独墅湖的渐进积累，而是以高能级大学落地为战略触发点进行圈层化空间组织。南大苏州校区引入后，苏州高新区出台《环南大科创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将既有科研节点纳入统一空间治理框架。空间上西南部依托太湖岸线形成生态休闲板块，南大苏州校区居中承担知识资源导入功能^[6]，中部集聚中科院苏州生物医工所等科研平台形成科创核心，东北部依托光电产业园、长光华芯等节点构成产业化承接空间，形成由高校向外逐步扩展的圈层化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苏州异地高校几乎全部嵌入工业园区和高新区内部，充分利用开发区已有的制度优势、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7]，有效避免了另建“孤岛式”大学城的困境，开发区体制是两个集聚区持续运行的重要制度基础。

（四）人才本地化：让高校培养的人才留在苏州

引进高校的最终目的是为本地培养和留住高层次人才。苏州通过多种机制将人才培养过程与产业需求深度绑定^[8]。高校在专业设置上精准对接地方主要产业，例如南京大学苏州校区。高校与本地企业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和实习实践基地，让学生在学期间即接触产业实际问题，上海交通大学苏州人工智能研究院通过联合培养将大量研究生输送到本地 AI 企业是其典型体现。鼓励高校教师到企业兼任“科技副总”、企业工程师到高校担任产业导师的双聘机制，推动了知识在校企之间的双向流动。在创业支持方面，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孵化的纳维科技、中科融合等本土创新企业，正是科研团队依托高校成果创业的直接产物。因此，2024 年苏州高校毕业生留存率约 60.4%，高于江苏全省和南京、

无锡，仅次于上海，产业生态对高层次人才形成了较强的吸附效应。

三、对城市发展的启示与建议

苏州通过持续引进异地高校院所，走出了一条从“园区经济”到“创新经济”的转型之路，其核心经验可概括为：以制度供给打通知识资源进入通道，以平台建设连接转化链条，以空间集聚形成创新生态，以人才本地化留住创新资源。

苏州的实践为其他“有产业、缺高校”的城市提供了四点启示。其一，引进高校必须与本地产业方向深度匹配^[9]，苏州引进的高校院所学科高度聚焦于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主导产业，若专业设置与产业脱节则难以形成有效互动。其二，政府需扮演“制度中介”角色^[10]，高校与企业在目标取向、评价标准和运行节奏上存在结构性差异，政府不能只当“房东”，更要当好“连接器”和“赋能者”，持续降低校企合作的交易成本。其三，高校必须嵌入开发区和产业园区而非另建孤立大学城，空间邻近带来的高频互动和人才流动是知识溢出的关键前提。其四，引进高校是长周期、高投入的过程，苏州从 2002 年启动到科研转化见效前后跨越近二十年，地方政府需保持战略定力，提供持续的制度供给和财政支持。

与此同时，苏州模式高度依赖其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开发区治理能力和雄厚财政实力，产业基础薄弱的城市不宜简单复制，关键在于找到知识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有效接口，因地制宜实现从“知识集聚”到“能力生成”的真正转化。

参考文献

- [1] 田凤，姜宇佳. 高校异地办学的利弊分析及其分类治理 [J]. 教育发展研究，2022，42(05): 9-14.
- [2] 赵俊芳，王博书. 一流大学异地办学的生成逻辑与增值效应 [J]. 高等教育研究，2020，41(04): 37-44.
- [3] 施一峰，王兴平. 创新导向的开发区再开发模式研究——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J]. 现代城市研究，2019，(07): 118-125.
- [4] 刘洪民，王诗琪，吕海洋，等. “四链”融合、集群政策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演进关系及作用机制——基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单案例分析 [J]. 科技管理研究，2025，45(10): 81-94.
- [5] 蒋阳，张京祥，张嘉颖. 创意人群与空间互动的场域：对城市创新空间本质解读 [J]. 城市发展研究，2022，29(09): 100-107+117.
- [6] 段一行. 从“经济效益”到“空间品质”——构建适应未来中国发展的创新空间评价新体系 [J]. 城市规划，2024，48(05): 71-80.
- [7] 罗小龙，杨凌凡，李小龙，等. 中国开发区的国家空间重组与治理——开发区 40 年治理演化的分析 [J]. 城市规划，2026，50(02): 57-66.
- [8] 孙锐，孙雨洁，孙彦玲. 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构成与运行机制研究——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J]. 中国科技论坛，2021，(11): 113-122.
- [9] 温铁军，谢欣，高俊，等.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苏州工业园区结构升级案例研究 [J]. 学术研究，2016，(02): 82-89+177-178.
- [10] 张京祥，殷洁，罗小龙. 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化研究 [J]. 人文地理，2006，(04): 1-6
- [11] 滕堂伟，葛冬亚，胡森林.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结构及空间联系优化研究 [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12): 42-48.